

西南地区圆觉菩萨造像民俗化倾向

谢彩

圆觉菩萨造像在国内并不罕见，绘画、雕塑等形式的作品都涉及这一题材。“圆觉菩萨”名称来源于《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》（右图），收录于《乾隆大藏经》第四十五册，唐闍黎沙门佛陀多罗译。为便于论述，下文统一使用常用名《圆觉经》。

根据《圆觉经》所述，在一次法会上，佛陀指出“一切如来本起因地，皆依圆照清净觉相，永断无明，方成佛道”。随后，十二位菩萨依次向佛陀提问，分别是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普眼菩萨（观音菩萨）、金刚藏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清净慧菩萨、威德自在菩萨、辩音菩萨、净诸业障菩萨、普觉菩萨、圆觉菩萨、贤善首菩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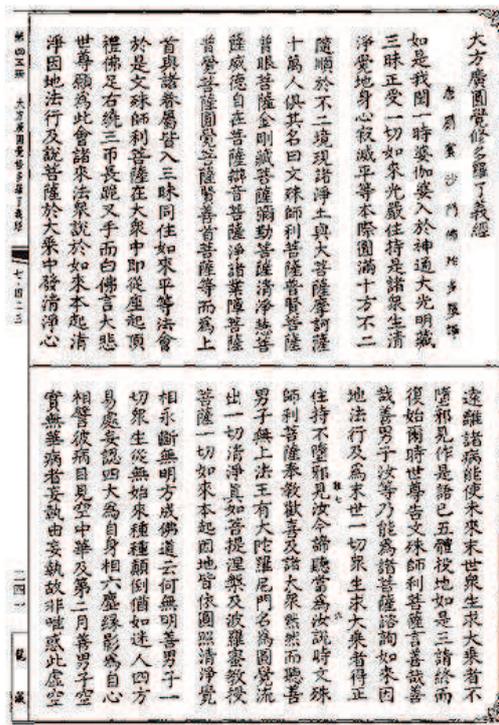
在雕塑史上，这十二尊菩萨的造像常以群像出现，简称为“十二圆觉”。事实上，《圆觉经》的传播与十二圆觉造像在四川地区的广为人知是在宋代。原因有二：一是《圆觉经》所弘扬的方法论，将“世间法”与“出世间法”打成一片，“顿机众生从此开悟，亦摄渐修一切群品”，易引起宋朝僧侣和士大夫共鸣；二是历史上《圆觉经》权威注疏者宗密禅师籍贯四川（今四川西充县）。他与圆觉菩萨造像在四川传播有甚深的因缘关系。

在我国西南地区，以《圆觉经》作为造像题材的著名石窟有两处，一是安岳洞窟群的9号圆觉洞；二是大足宝顶大佛湾29号窟圆觉洞。这两处石窟的具体开凿时间至今尚未有定论。过去学者多根据清代光绪《安岳县志》的记载，认为安岳9号圆觉洞是北宋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开凿。而学者李崇锋则根据实地调查，倾向于认定9号圆觉洞开凿于南宋庆元四年（1198年）。

至于大足宝顶山石刻，学者们倾向于认定绝大部分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（1174—1252年）。其中圆觉洞编号29，位于大佛湾造像的南岩西段。过去，有部分学者基于在西南地区的实地调研指出：在四川境内以《圆觉经》为题材的石刻造像在两宋以前和以后都没有，仅在两宋时期有几处（详见丁明夷《四川石窟杂识》，《文物》1988年第8期第46—58页；胡文和《四川摩崖石刻造像调查及分期》，《考古学集刊》第7集，第79—103页）。

两宋以后，四川境内真的再无圆觉菩萨造像产生了吗？

说有易，说无难。四川泸州法王寺即收藏有圆觉菩萨石刻造像，系清朝嘉庆年间作品。这十二圆觉



《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》

菩萨石刻造像的特征如下：
其一，从造像年代来看，除了一尊（伽蓝菩萨，见图③）刻于嘉庆四年（1800年）以外，其他十一尊都刻于嘉庆三年（1799年）。
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，根据《圆觉经》的描述，十二尊请法的菩萨当中并无伽蓝菩萨。而这批造像在底座中标明是“圆觉”身份的菩萨只有十一

尊。由此，我们是否可以这么假设：这批造像的总数有可能是十三尊（十二尊圆觉+一尊伽蓝），因为某些原因，现在遗失了其中一尊。而这尊伽蓝菩萨与其他圆觉菩萨造像风格是统一的（下页图⑥）。
从民间风俗习惯来看，关公在佛教、道教皆受尊崇，在佛教界被视为护法神，佛寺为之

设置“伽蓝殿”，因此功德主们在捐资造十二圆觉菩萨像的同时，决定增塑一尊伽蓝菩萨，似合乎情理。

从展览逻辑来看，根据《圆觉经》的内容，最简单的方法即造像安排为一字排开，中间立三释迦牟尼佛、药师琉璃光如来、阿弥陀佛三佛，左右两侧各为六尊圆觉菩萨。但这样布展会有一个问题——显得较为呆板，缺乏现场感。《圆觉经》开头称十二位菩萨在修行中遇到了不解的问题，需要向佛陀求救，所以，在展览中，若要还原菩萨向世尊请法的场景，道场却没有安排一个提问者，就显得不自然。

根据现存大足宝顶山石刻遗址来看，其圆觉洞的布局颇有意思，洞窟内的造像安排为“倒U字形”形式，主像三尊坐于正壁，三佛前跪拜一菩萨，左右壁各有六尊菩萨呈对称坐式，这就很好地切合了《圆觉经》的主题内容。

大足圆觉洞布展的神来之笔是——于三佛前设计了一尊身份模糊的化身菩萨——表示请法，由此，则不必因为动用左右壁任意一尊菩萨、从而造成一边六个而另一边五个的形

（下转16版）➔

（上接14版）

加以承认的，应当是其原来理想所具备的正面价值的方面。我们须知，理想之不足，是在理想伸展为更高更大之理想时，才反照出来的。现实上的缺点与坏处，是在我们实现理想时，受了限制，阻碍及其它牵挂而后反照出来的。此乃属于第二义。我们能对于个人先认识其理想的长处，则我们可先对人有敬意。再继续以认识其理想之不足与现实上之缺点，以表现我们对他的爱护，对于为人类客观精神生命之表现的文化，也应当如此。”

此处虽说现实之能否充分展现理想，乃属第二义。但若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巨大差异，而仅剩寡头的理想，亦为大遗憾。由究竟意义上，当然是理想与现实结合。如唐先生之写《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》，极力赞扬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，表彰其间种种的美好精彩，即以理想召

唤，期待全民朝此方向努力，期待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皆能成为理想之具体呈现。宣言虽对近代中国之现实婉转维护，但唐先生等人在这点上是很清楚的；我们不仅希望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传统理想有敬意，同时希望他们对现实上的文化表现也有敬意；亦即对文化理想之落实于现实中，而起敬意。

在文化的理想层面上，宣言提到，西方应该学习东方的智慧。“第一点，我们认为‘当下即是’之精神，与‘一切放下’之襟抱。”“第二点，是一种圆而神的智慧。”“第三点，是一种温润而悃惻或悲悯之情。”“第四点，是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。”“第五点是天下一家之情怀。”这些智慧是希望西方学习我们的，当然，在这之前，我们要问，中国人自己肯定、重视这些智慧吗？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出这种智慧吗？这些文化理想或智慧是于现代活着的，还是仅存于古代的古董？

中国文化的兴衰起落终究要靠中国人自己。1974年，唐先生于五四纪念日对香港青年学生讲话（《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》，台北：学生书局，1988年，下册，页334—340）。其中提到对海外中国青年的五点期许：首先，做一个人。亦即重人禽之辨，重视伦理，修养品德，创造真善美文化。第二，做一个中国人。唐先生强调：“于此我要先提醒诸位注意，此‘中国人’的观念，并不是以我一时所居之地域而定，亦不是依现代的国籍法而定。此乃是依血缘而定，亦即依我们之生命之本原而定。只要我们之血缘，我们之生命之本原，是中国人，则我们永远是中国人。但我们更须常常自觉此我永远是中国，自觉的求真正作一个中国人。如何才算真正作一个中国人呢？此更要在常常自觉我一人之生命，与我之血缘不可分，与整个中华民族不可分，由此以扩大我个人之生命生存的意义与价值。”第三，做一个心灵开放的中国人。第四，做一个尊重中国

历史文化与历史人物的中国人。第五，做一个承担延续发展中国历史文化之责任的中国人。唐先生说：“今日之时代，不同过去之时代。一时代总有一时代的问题。无论作事与为学，总不能闭眼不看时代的问题。这不是说人只求适应时代。对一时代中的一切事物，我们都应以批判的眼光，去看其是否合乎真善美的标准，而加以裁判、选择。由此以决定我们自己的行为的方式，形成我们自己的人格，以创造未来的时代的中国与世界。”

唐先生这段话当时是对香港的青年说，其实也可对每一个中国人说。前两年唐先生全集在大陆出版，标示的句子即是：“做一个人，做一个中国人。”其实，这几句话的涵义甚深，期许与相应之责任，绝非一般。唐先生说的“做一个人”，已经归结了整个成德之教的君子之学。而“做一个中国人”亦不只是单纯的国族认同，更涉及文化认同与文化承担。如果能如唐先生的期许，而有众多中

国人朝此方向努力，则不但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高度的认同与自信，也能传承优点，结合传统文化资源，开创现代生活中的真善美等价值。如此，即是中国文化理想在现实中的具体创造与实现。

中国人应该把中国文化当成活的文化，而把自己当成这个活文化的一个成员，也是这个文化创造与具体实践的参与者。若接受这个观点，则我们可以进一步聚焦于中国哲学之研究，对于中国人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问题，套用上述观点而回应如下：中国人（尤其是学术工作者或知识分子）应该把中国哲学当成活的哲学，而把自己当成这个活哲学的一个成员，也是这个哲学创造与具体实践的参与者。唐先生的一生，已先完成对青年之五点期许，晚年又完成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》，更为后继者展示如何为当代中国哲学注入原创的活水。

（作者为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）